

# 犯罪报告:国企高管平均贪2000万 民企老板涉黑多

去年底,陕籍律师王荣利发布了《2013年度反腐“打老虎”案例分析报告》,聚焦23名副省部级以上的落马官员。不到一个月,王荣利再次推出另一份“犯罪报告”,关注落马的企业家。117例国企高管和233例民企老板在2013年度犯事,几乎相当于每天曝出一起大案。

被誉为“民间反腐研究第一人”、“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第一人”的陕籍律师王荣利,再次推出《2013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例报告》。

与历年来相关报告不同的是,王荣利将其与此前推出的《2013年度反腐“打老虎”案例分析报告》(对比来看,发现许多副省部级以上的落马高官,与落马企业家“联系”紧密。

## 涉案国企高管人均贪腐1935万

与往年一样,这份报告的相关信息全部来源于官方及新华社等媒体的公开报道。此外,该报告由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牵头申报,被正式列为201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报告培育项目,项目组别为“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王荣利被聘为西北政法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2013年度涉及企业家犯罪案例为350例,其中国企高管涉案117例、民企老板涉案233例。“相当于平均每天发案一起!”

在117例国企高管涉案案件中,除了自杀等5例外,其余112例均构成或涉嫌刑事犯罪,分别处于组织调查或立案调查、拘留、逮捕、起诉,以及一审、二审阶段,部分案例已结案。112例案例中,已经明确被移交司法机关的有67件,占案例的近六成,其中仅4例属于重大责任事故等罪行,63例均属于经济犯罪,占到94%。其中,已确定犯罪的罪名多达80个(次);受贿罪最多,30例;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次之,分别为13例和11例。

犯罪金额也备受关注。60余起经济案件中,共计涉案金额约109亿元,其中包括浦发银行郑州21世纪支行副行长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案63.95亿元及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哈尔滨松街支行行长涉案28.9亿元。若将这两例案件除外,其他案件涉案金额约16亿元,每案平均涉案金额达3063万多元。在40余例案件中已查明所涉贪腐总额达8.3亿多元,平均每案贪腐所得约1935万元。

记者梳理王荣利历年发布的相关报告对比发现,2010年,该数据(犯罪国企高管均贪)“即将突破”千万;2012年,人均贪腐高达3000万。足见“前腐后继”,国企高管经济犯罪的数量及涉案金额,居高不下。

## “中”字头及四川国企落马高管多

报告显示,相较于往年,2013年度,“中”字头的国企落马高管尤其多。112例案例中,中石油系统至少有9名企业高管被判刑或正“接受组织调查”,包括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中石油副总王永春,以及中石油的两名副总、总会计师、总地质师,还有其下属大庆油田分公司、印尼公司的老总、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等多人。

另几个“中”字头的涉案国企也备受关注。中远集团下属的中海集团系统“接受组织调查”的有多人,包括中远集团副总兼中海集团副董事长徐敏杰、中海油运生产运营部副总刘厚平。中国移动系统再次有多名高管落马,除中国移动原副总经理鲁向东被判刑外,中国移动天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权明富、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总经理徐龙、中国移动广州公司总经理李欣泽均被调查。

从地域来看,王荣利发现,颇有影响的国企高管涉案中,以四川省为最多;包括成都银行、



成都建工集团成都中医大资产管理公司,以及成都市兴蓉集团、成都市高新投资集团等多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十余人涉案。

## 非法集资案动辄涉案数十亿元

比117例国企高管涉案更多的,是233例民企老板涉案,案例多出几近一倍。其中的203例均涉嫌刑事犯罪,有196例涉及经济问题,占犯罪案例的近97%。超过半数的案例属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其中查明人数的106例案件涉及近1800人,平均每案约17人。

截至2013年底,有115例民企老板犯罪案例明确了犯罪罪名,累计触犯197个(次)罪名,平均每例触犯1.7个罪名。其中,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同样多,各有15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经营罪与诈骗罪一样,均为10例。

而民企老板涉及行贿受贿罪也有15例。其中对单位行贿罪6例、行贿罪6例,还有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各一例。

与往年类似,犯罪的民企老板涉黑案件依然较多,暴力侵犯公民人身安全的案件有7例。其中故意杀人罪2例,爆炸罪、故意伤害罪、敲诈勒索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各一例。此外,涉及到食品安全的案例也有12个,案例涉及非法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在203例涉黑刑事犯罪案例中,已公开的98例披露了涉案金额,动辄高达数十亿元,累计达3417.942亿元。最大是宁夏鼎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台州分公司负责人陈立喜特大非法经营黄金期货案,非法期货交易金额高达1744亿元余元。

这些案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有25例,其中17例累计近272亿元;集资诈骗案有22例,其中19例累计近285亿元;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18例,不仅涉案人员累计多达826人,其中15起案件共涉金额近388亿元。

而集资诈骗、涉黑、杀人已是如今民企老板走上“不归路”的最主要罪名。2013年,有3案4人被执行死刑。一是湖南三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裁曾成杰,二是山东青岛“黑老大”聂磊,三是“比煤更黑的黑”云南泸西煤矿“主王建福及其下属打手王飞云。这三起案件分别涉及集资诈骗、“涉黑”、涉杀人、爆炸等罪行,反映出民企老板最严重犯罪的几种情况。

(摘自《华商报》)

## 回家过年成本调查:半数人预算超五千

俗话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过年,是大多数中国人年末期待的“大事”。虽然伴随着熬夜抢票、挤在旅途等金钱成本、时间成本,多数人还是备好年货、行李,掰着指头算还剩几天回家。

日前,新京报记者抽样调查100位不同身份回家过年的在京务工人员,有五成受访者表示,回家的预算已达5000元到10000元,甚至还有3万多元的。四成人表示,回家的花销已经成为“团圆的负担”。

## 12人回家预算超1.5万元

参与此次抽样调查的白领、农民工、公务员以及其他行业的人员各25人,月收入一两千到过万不等。这些人里九成是青壮年,他们回家不仅要看看父母和老同学,有的人的妻儿也在外地。

但回乡是一定要花钱的。在回家预算中,不仅要支付往返的路费,有的人还要备年货送亲友、给父母生活费,给小辈压岁钱。据统计,53人的过年预算已经超过了5000元至10000元,预算达1.5万元以上的有12人。其中,最高的达到了3.3万元。

## 回家花费中五成孝敬父母

并非只有高收入者才花得多,从统计上看,至少半数人称,这些花费已经是自己一个月的工资甚至两倍更多。“我每月收入3000多,过年回去一趟都花了。”在建筑工地务工的河北邯郸人姚女士坦言。此次调查中,有42人认为,回家的花销成了负担。

这些预算里,孝敬父母的钱最多,48人这块花费排首位;其次是给亲戚朋友买礼物以及过年送礼的,有25人;路费花费最多的有22人,这些人老家大多数是离京较远的“热门城市”,因回家买票难,只能选择全价的机票和贵价高铁票。

## 两成人烦恼回家被逼婚

回家过年,开心的事也有烦心事。最高兴的莫过于全家团聚了,69人首选这项。此外,期待过年的理由还有能吃到妈妈做的饭,不用上班,可以睡懒觉,和朋友喝酒、打麻将等。

烦心事也会接踵而来,有两人预计和爸妈和睦不了几天就会变成吵架。“相处三天以上必吵架,他们开始看我不顺眼,我爸埋怨我妈没把我教育好,埋怨我每天那么晚不睡,早晨又不起床。”摄影师李小姐说。

还有人烦恼于无休止的串亲戚和被逼相亲、逼婚、逼生孩子。有22名受访者讨厌串亲戚、赴酒局,21人称一定会有七大姑八大姨逼婚的经历。紧接着排在第三的烦恼则是假期太短,还没休息过来就得长途跋涉的回京工作了。

## 专家说法 “回家成本不能用钱来衡量”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过年回家是一种传统文化,已在很多人心中根深蒂固,“过年回家的成本,不能简单地用钱来衡量。”刘元春说。

刘元春表示,很多在北京打工的外地务工人员,会在回老家过年时,给父母高于自己工资几倍的金钱,这主要是体现一种孝道,“很多人在外地工作,都是希望在老家的父母能过得更好。”刘元春说。

刘元春认为,一些在外地工作的人员,平时无法照顾家庭,对父母的关怀不够,通过给父母金钱,来弥补心中的歉疚,“人们普遍的愿望都是‘父母在,不远游’,大家会尽自己的努力,回到家乡,和父母一起共度春节。”刘元春表示,一些人拿出高于工资几倍的金钱给父母,也体现他们孝敬父母、光宗耀祖的心态。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鸾表示,子女孝敬父母,拿出工资几倍的钱回家孝顺父母固然没错,但也不应过于辛苦,要学会适当改善自己的生活。

而对于一些大龄青年被家长逼婚的清苦,夏学鸾认为,父母不该办子女的感情生活,这样容易产生矛盾,同时也希望子女理解父母的苦心。

(摘自《新京报》文/刘洋 李馨 李禹潼 朱自洁 李雪莹)

# 民营担保公司遗言:4万亿退潮 企业客户十儿人死

只要对方电话一关机 十有八九要坏事

“我这算是从天堂到地狱了吧?”南京鑫信担保集团(下称“鑫信担保”)董事长付树兵对记者说起自己的经历,圆脸上依然有习惯性的笑容,但一个接一个的电话,却不渐透露出他的煎熬和焦灼。

鑫信担保是南京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几年前高峰时期对外担保总额近40亿。如今,随着“4万亿政策”的退潮和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其数百家客户纷纷陷入困境,有多家企业破产倒闭或者老板跑路。

三年来,付树兵的客户端有十几人死亡、30多人跑路。鑫信担保不断替客户还贷,在付出近4亿元现金后,如今也被拖入了资金枯竭的困境,接近200人的企业只剩下7名员工。

付树兵告诉记者,鑫信担保一倒,可能会有600家企业受连累。

## 一年多代偿近4亿元

按照几年前的设想,鑫信担保如今应该在自己的总部大厦办公。这栋大楼设计为18层,位于南京高端写字楼密集的河西板块。高峰时期,鑫信担保为600多家企业作担保,年对外担保总额近40亿。

南京市担保行业协会的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3月末,该市融资性担保机构91家,其中南京鑫登投资信用担保公司注册本金最大(17.8亿元、外资),鑫信担保和融信担保金最大(均为3亿元)。

如今,这一切光荣与梦想,已经被打风吹去。当年准备建楼的地块,已经卖掉,连付树兵的奔驰车也已经卖掉。

在这背后,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担保行业的“过山车式”的震荡。

2011年下半年开始,“4万亿”经济刺激

计划退潮,随着货币政策收缩和宏观经济下行,大量的中小企业坏账爆发。担保公司是介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防波堤,企业一倒下,压力便冲向防波堤。各地老板跑路,担保公司陷入困境的事件开始频频发生。

2012年2月,受京广两地相继爆发的中担、华鼎、创富三家担保公司违规事件影响,绝大多数民营担保机构的业务被商业银行“一刀切”,进而导致全行业业务量急剧萎缩。

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数据显示,在北京、广东、浙江等担保机构较多的地区,新增融资担保额首现负增长。代偿方面,截至2012年末,全国担保代偿余额250亿元,代偿率为1.3%。而2011年全国担保机构代偿率平均为0.42%,2010年仅为0.16%。

这一波巨浪冲击,鑫信担保也不能幸免。付树兵告诉记者,自2011年8月~2012年年底,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鑫信担保已经为客户代偿近4亿元。

付树兵说,2012年春节以来的日子,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光,几乎隔三差五就接到所担保的中小型企业负责人跑路失踪的消息。他没有一天能睡个安稳觉。

足生堂老板跳海自杀被救起、饰家装饰老板割腕自杀被救活、红木家具厂资金链断裂、力王起重中机厂老板意外死亡……3年来,付树兵的客户端有十几人死亡、30多人跑路,陷入困境而强撑着的则以百计。

“只要对方电话一关机,十有八九要坏事。”他说,“我这算是从天堂到地狱吧?但我还得活下去啊!我父母我妹妹的房子财产也都抵押进去了。但是心态要放平淡,以前辉煌,现在无非是到平地上了。要没这个心态,我可能死得比他们(客户)都早。”

## 银行的角色

付树兵总结说,他的客户倒下的原因,除个别是因为企业老板吃喝嫖赌导致企业“非正常死亡”外,原因一是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导致的企业倒闭或被关闭;二是“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退潮,导致不少扩张中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三是企业互保互保,坏的连累了好的;四是司法系统运行效率低下,导致企业之间的债务清算极为缓慢,拖垮了不少企业。

2013年底,记者来到南京溧水博瑞特工艺品公司。五层楼的厂房崭新明亮,但却已经空空荡荡。该公司原来有近200名职工,年销售额在5000万元左右,2012年时还在盈利,但最终被一口气憋住,资金链断裂倒地。

该公司负责人吴某原是当地的成功人士,多年来专注搞实业,也没什么不良嗜好。但企业所受的打击,几乎将他的精神摧毁。“我都打听了哪儿能卖肾。”他一边说着,落下泪来。临近中午,他捏着口袋里仅有的几百元钱,邀请记者吃午饭,记者不忍而婉谢。

吴总告诉记者,2009年,“4万亿”计划出台后,多家银行找上门来。有银行当时发放贷款1600万。2011年夏天,这笔款项被收回,不再续贷。

而此时,吴总正在着手建设新的工厂大楼,同时投资了一个农业项目,数千万元的资金沉淀其中。在其他银行采取类似做法后,吴某顿感资金吃紧,只好左右腾挪。

吴某告诉记者,当时一家大型国有银行的负责人说,只要先把款还上,之后马上可以续贷。但他好不容易凑齐了钱还上之后,银行却食言了,说必须重新找一家国有担保公司担保方可续贷。贷款由此断掉。

# 专家谈5.6万能买几平米:三四线城市家庭一年能买一套房

2013年全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6955元,实际增长7%,跑输经济增速。而统计划定的可支配收入5.6万元属于高收入,也引发网友吐槽和质疑。

专家分析,居民收入跑输经济增速有税收体制、劳资关系和价格等多个因素影响,反映了我国收入再分配制度滞后。“5.6万属于高收入”还要看中位数和区域差异,不能只从某个区域的角度看待;而且这个收入的家庭在三四线城市一年就可以买一套房了。

## 专家:居民可支配收入跑输GDP很正常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9547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这一增幅低于2013年GDP增速7.7%,这一现象引起了民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居民可支配收入为何跑输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是很正常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在接受中新网财经频道采访时解释,首先税收是累进的,在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情况下,税收收取也要高一些;第二是,劳资关系没有很

好调整,导致工资收入增长跟效率增长不完全匹配,特别是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企业和资本从经济剩余里面获取更多一些。除此之外,还有价格因素的影响。

不过刘元春强调,居民可支配收入跑输GDP也反映出我国平衡一次分配格局的再分配力度远远不够。据他分析,第一,国家有大量的税收和财政并没有用于转移支出,没有成为居民的实际收入,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被转换成投资资金,被用于政府消费,转移支付的比重太小。第二,企业的利润分配给员工和居民,没有让所有者和股东分享增长的收益,在中国集中体现在国有企业的利润没有转化成居民收入也没有转化成财政,而是转化成投资。另一个是上市公司不给股东分红。

“中国目前的分配制度滞后性还是比较严重,从初次分配到再次分配可能面对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他认为,这导致在经济回落过程中,居民收入增速的回落更快。

## “5.6万高收入”者占抽样调查人数的20%

根据统计局按城镇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1434元,中等

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8483元,中等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4518元,中等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32415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6389元。

刘元春表示,核算的高收入的定义跟大家理解的高收入不太一样。在统计核算时,抽样调查的20%算是高收入,而民众觉得高收入就是收入特别高的那一部分人。很多网民都是从自己所在区域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会感觉偏低。他们没有看到全国人均GDP是4.2万元,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24200元。如果从中位数来看,5.6万已经是它的2.3倍多了。

“最关键的是低收入者收入太低,可支配收入只有1万多,这部分人也占20%。像青海和贵州的人均GDP就是很低。”刘元春对中新网财经频道表示,一方面,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是相对较低,低收入者的收入也比较低。另一方面,统计抽样调查时,灰色收入并没有统计进来,高收入人群主要是民营企业家和白领。

## 专家:人均5.6万三四线城市家庭一年就可买一套房

刘元春进一步解释,我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税后概念,不是每个个体的收入,而

是按家庭计算的。他举例,按一个家庭3.5个人计算,再乘以5.6万,这个家庭一年就有近20万元的可供支配收入了,这个收入还是可以了的。“这样好像就有点谱了。我们从这些角度去看就更好理解,跟大家感觉的差距也会缩小。”

不过,对于统计局将可支配收入5.6万元划入高收入,不少网友调侃和吐槽,“5.6万的高收入能买几平米?”

“中国的房价是偏高了,一些地方的房子太贵,尤其是区域之间的差别过大。一般民众看到的是北上广房价奇高,5.6万很难买得起两三平米。”但在刘元春看来,中国不是所有的人都买得起房,支撑中国房地产的主要是高收入人群,特别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他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可能达到15万元。

他进一步分析,现在北上广的人均GDP超过了6万元,如果按统计局的标准,北上广的居民都属于高收入阶层了。而且按家庭计算,已经有20%的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在20万元以上,这个收入不算低。“在落后地区或者三四线城市,房价两三千一平,这样的家庭一年就可以买一套90平的房子了,这个是很恐怖的啊。但在北京繁华地区就只能买几平米了。”(来源《中新网财经频道》)